

中共河北省党校西柏坡研究中心丛书

西柏坡时期党的建设

孟庆云 牛余庆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西柏坡时期党的建设

孟庆云 牛余庆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柏坡时期党的建设 / 孟庆云, 牛余庆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202-09522-5

I. ①西… II. ①孟… ②牛… III. ①中国共产党—
党的建设—研究—1947~1949 IV. ①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8225 号

书 名	西柏坡时期党的建设
著 者	孟庆云 牛余庆

责任编辑	王 静 王 岚 李 耘 陈冠英
美术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赫 江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	---------------------------------------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	---------------------

印 张	10
-----	----

字 数	119 000
-----	---------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1—3 000
-----	---------

书 号	ISBN 978-7-202-09522-5/D·730
-----	------------------------------

定 价	24.0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教材编委会

主任委员

刘忠昌

副主任委员

任树江 刘书才 张平英 刘士卓

侯贵星 岳俊辉 李胜茹 张奇光

成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宇飞 王秀华 付文明 冯学工 李凤瑞 李彦青

李志强 孟庆云 庞立平 路淑芳 穆瑞丽

总 序

从 1947 年 5 月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至 1949 年 3 月中共中央迁移北平，这一年十个月构成了中共党史上的“西柏坡时期”。

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领导了全国土地改革运动；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九月会议”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建立了华北人民政府。由此在我们党的历史中铸就了三座丰碑，即：革命战争史上的丰碑、政权建设史上的丰碑、党建思想史上的丰碑，实现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西柏坡一年十个月的伟大实践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辉煌灿烂的篇章，积累形成了治军、治国、治党等方面的特别丰富而又独具特色的宝贵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在 60 多年后的今天，对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为了更深入、更系统地梳理总结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的光辉实践和宝贵经验，河北省委党校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编写了关于西柏坡时期建设的系列丛书，包括：西柏坡时期政治建设、西柏坡时期经济建设、西柏坡时期文化建设、西柏坡时期社会建设、西柏坡时期党的建设、西柏坡时期军事建设等。

系列丛书围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的革命实践和理

论创新，在回顾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凝炼历史经验，提出现实启示，旨在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路径和精神动力，也为学术界进行西柏坡研究提供参考。

丛书的出版得益于河北省委党校许多专家的辛勤研究和工作，也得益于河北省委党员干部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西柏坡研究的大力支持，在丛书出版之际，一并表示感谢！

刘忠昌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前 言

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从1947年5月3日刘少奇率中央工委到达西柏坡，到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共一年十个月的时间。但在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书写了中国革命伟大实践的辉煌篇章。党的土地工作会议在这里召开，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从根本上彻底铲除封建的土地制度的根基。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军事大决战，书写了战争史上的军事奇迹，为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奠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这里形成，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在这里实践，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在这里构思，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之所以能书写出中国革命伟大实践的辉煌篇章，并成为领导新民主主义胜利的一座历史丰碑，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牢牢把握并较好地运用了党的建设这个主要的法宝，并把党的建设这个伟大工程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成熟并强大到足以能够实现从领导农村向领导城市，从领导革命向全国执政的战略转折，并顺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八大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行了总体部署，要求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今天，我们回顾总结党在西柏坡时期党的建设的光辉实践和宝贵经验，对于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不断增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目 录

第一章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新阶段 >>> 1

- 一、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历史探索
- 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提出
- 三、西柏坡时期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第二章 西柏坡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 24

- 一、延安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 二、西柏坡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内容
- 三、西柏坡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启示

第三章 西柏坡时期党的组织建设 >>> 45

- 一、全面内战爆发后党组织建设的整体调整
- 二、西柏坡时期党的组织建设的主要内容
- 三、西柏坡时期党的组织建设的经验启示

第四章 西柏坡时期党的作风建设 >>> 78

- 一、从延安整风到“两个务必”
- 二、西柏坡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的主要内容
- 三、西柏坡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的宝贵经验
- 四、西柏坡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启示

第五章 西柏坡时期党的制度建设 >>> 108

- 一、西柏坡是立规矩的地方
- 二、西柏坡时期党的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
- 三、西柏坡时期党的制度建设的宝贵经验
- 四、西柏坡时期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启示

第六章 西柏坡精神与中国梦 >>> 132

- 一、西柏坡精神的科学内涵
- 二、西柏坡精神的本质特征
- 三、西柏坡精神的当代价值
- 四、西柏坡精神与中国梦

主要参考文献 >>> 146

后 记 >>> 147

第一章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新阶段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样一个党，始终是引领和贯穿党的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早在 1939 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之所以能书写出中国革命伟大实践的辉煌篇章，并成为领导新民主主义胜利的一座历史丰碑，同样是由于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牢牢把握并较好地运用了这些主要的法宝，特别是做好了党的建设这篇大文章，把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推进到了一个新境界。

一、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历史探索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中国政治生态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但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外国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次次战争，签订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到 20 世纪初，中国虽然在形式上仍保持独立，但实际上已经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任意宰割的半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亡族灭种的危机。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政治上不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遭到严重破坏，司法和行政统一不复存在，外国列强

可以任意掠夺奴役。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工商业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传统的农业经济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资本主义列强控制了中国的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海关、对外贸易和交通事业，把中国变成了他们原料、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地和商品倾销地。在外交关系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政府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附属。在思想文化上，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传教、办学校、办报纸等方法，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从精神上麻痹中国人民。加之，资本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结盟，收买和操纵军阀势力，到 20 世纪 20 年代，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各派军阀寻找帝国主义列强为后盾，长期割据混战的政治局面。

这种帝国主义列强疯狂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进行掠夺的暴行，这种封建军阀对外丧权辱国，对内镇压人民的腐朽政治，内战不断，民不聊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不能不引起人民的极大愤恨和奋起抗争。因此，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此起彼伏、风起云涌，改造中国、救亡图存，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渴望和时代的呼唤。

一个不甘心沉沦的民族，尽管在腐朽没落的政治统治之下，社会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但其中已经产生了组织起来的冲动，开始孕育着政党的萌芽，并且一度出现短暂的多党政治的局面。

1923 年 8 月 1 日出版的《少年》杂志第 7 号发表文章，把那个时期的党派、政治势力概括为十大类：新兴实业家、全国大部分商会、教育界大部分、进步党、基督教徒、广东香港商人、益友社、交通系、安福部、国民党。前五派的共同纲领是“教育实业救国”，他们已经认识到，军阀统治是实业救国的障碍，他们微弱的经济地位和群众基础，使得他们始终想巴结一个“较好的”、最有实力的军阀来制服别的军阀以统一中国，以发展教育和实业。这一类政治势力倾向于军阀吴佩孚，依靠美国的支持。广东香港商人大都是商业资本

家，他们依赖英国银行资本，极力排斥日货；益友社原是国民党党员，经济地位优越，从国民党中脱离出来，与自治派军阀结合。这两派倾向陈炯明，依靠英国的支持。交通系完全由一帮卖国官僚组成，与安福部由张作霖和段祺瑞培植，主要依靠日本。可见，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操控下的中国社会，很难产生具有独立意义的政党。所有旧式的政党势力都无一例外地把人民群众排斥在外。

1905年，孙中山成立了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组成的同盟会，尽管这些团体各有自己的特点，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他们共同认可的目标。同盟会领导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之后，华兴会和光复会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实现，便不再革命。孙中山虽然明白“革命尚未成功”，但却被袁世凯的假共和迷惑，把革命果实让给了北洋军阀。之后，同盟会在黄兴、宋教仁的主持下，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政治势力合并，成立以进行议会为政治取向的国民党。

袁世凯联合统一党、民主党、共和党成立了进步党。不但在议会对抗国民党，而且极力破坏国民党，暗杀宋教仁，并最终解散国民党。随后，孙中山召集国民党党员组成中华革命党，举起反袁的旗帜，并于1919年决定恢复国民党名称，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尽管孙中山殚精竭虑，辛勤努力，致力革命几十年，但始终没有见到胜利的曙光，并于1925年在北京病逝，留下共和的遗憾。之所以出现这种结局和状态，原因有四：一是国民党热衷于发展党员、壮大组织，竞争选举，但却忽视了对党的自身组织的建设教育，党内一盘散沙，三民主义不但不为群众所知，就是党内成员也多是明不明暗不暗，一遇变局，便迅速解体。二是国民党议会政治失败后，便注重军事行动，但国民党却没有自己可靠的力量，不过是收买退伍军人和各地会门，并依靠个人的权力。三是在军事失败走不通时，

便联美联日，试图借帝国主义的力量推翻军阀统治，而帝国主义又不希望中国真正发展资本主义，因而也不可能给予真正意义上的帮助。四是在与帝国主义联合落空之后，国民党便走上与军阀妥协的道路，想利用这派军阀去推倒另一派军阀，其结果，必然是使国民党这个原本有些革命色彩的政治团体，逐渐走上与军阀同质化的道路，与真正的民主共和，只能是渐行渐远。

辛亥革命后军阀统治的一段时期，中国似乎出现一个多党政治的局面，但这些党派甚至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救国方案，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搬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努力引导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几经奋斗，没有一个走得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党派找不到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纲领不适合中国国情，严重脱离中国最广大的劳动大众，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就连最具革命性的国民党，也因其严重脱离国民而日渐陷入绝境。

（二）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随着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不断增加和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在迅速成长壮大。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 100 多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增加到了 200 多万。中国工人阶级除了具备世界各国工人阶级所具备的富有组织性、纪律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等特点之外，还具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起来的独特的特点：一是高度集中，容易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二是受压迫最重，革命起来比任何阶级都更坚决、更彻底；三是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在革命斗争中容易与农民结成可靠的同盟。这些鲜明的特点，对日后中国工人阶级政党建立和活动，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这几乎是一个万古不变的真理。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工人阶级剥削的日渐加重，中国工人阶级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便日益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

从五四运动至建党前，工人罢工达100次^①。工人罢工的形式和内容也从最初的反对外国技师、监工和残酷压迫，维护最低生活条件的自发经济斗争，逐渐发展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尽管如此，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阶级仍然是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的，还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

辛亥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飞速发展，军阀混战，土地集中，中国农民的生活境地也极度悲惨。广大农民阶级遭受封建地主、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层层盘剥，加以天灾人祸，以至于挣扎在贫困和死亡的边缘。这段时期，虽然没有大的农民起义，但各地的暴动却持续不断，如1912~1914年河南、安徽、湖北等地的白朗起义，1916年湖北、江西两省的哥老会斗争，1917年安徽省大刀会起事等。这些农民起义，同以往农民起义一样，斗争仍然处于自发状态。有的农民起义军毫无组织，甚至以封建迷信来做口号。这就决定，这种农民斗争，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民阶级的命运，也注定难以取得最终的胜利。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一次反帝反封的文化启蒙和思想的洗礼。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们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通过创办报刊，写文章出著作，深刻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的伦理道德，促进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1917年俄国爆发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陈独秀、李大钊借助《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刊物，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编发“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宣传“劳工神圣”，这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发挥了积极的

^①《中共党史》，党建读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推动作用。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洋政府卖国政策的五四运动，从开始以青年学生为主，到6月3日发展为上海工人的相继罢工，运动的中心也从北京转到上海，并遍及全国各地。全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不断高涨，特别是人数达六七万人的工人罢工斗争，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五四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五四运动以后，一部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也打开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之门。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也给我们送来了如何建设工人阶级政党的建党经验和建党原则。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既是中国社会条件成熟的结果，更是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直接帮助下实现的结果。1920年3月，共产国际得知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后，高度重视，决定派维经斯基率团到中国考察，目的在于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4月，维经斯基到达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并与许多进步人士座谈，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情况及内外政策。维经斯基在与李大钊多次交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后，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必须坚定不移地抓紧建立。5月，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见到陈独秀和上海社会主义者，与他们一同讨论社会主义问题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在维经斯基看来，中国思想缺乏主流，写文章、说空话的多，实际行动的少，这样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有必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来领导中国革命运动。1921年维经斯基到北京，与相关人士座谈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共产党员的基本信念等问题，并希望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尽快联合起来，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

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中国，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以及成立后各项工作的开展等都给予了一定的帮助。

1921年7月23日至8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参加大会的代表有13人，代表党员50多名。这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明确党的目标和任务：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公有。第一个党纲对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和设置做了具体规定，并对党员的条件和入党手续进行了规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个党纲，虽然只有15条内容，但也规定了党章的内容，实际起到了党章的作用，通常也被人们认为是第一部党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的中央局，负责领导全党工作，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会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紧张的自身建设工作：一是建立和健全了党的地方组织，扩大党的队伍，一年内发展到了195人；二是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三是于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发展准备了后备军；四是加强思想建设，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系统地翻译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虽然，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但党的组织还不完备，各种机构还带有临时性的特点。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创建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这次大会的突出贡献在于它制